

# 雙姝怨對

## 金瓶梅

### 【第三十八回】節選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開今文化

不說西門慶在夏提刑家飲酒，單表潘金蓮見西門慶許多時，不進他房裡來，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帳冷。那一日把角門兒開著，在房內銀燈高點，章定轉屏，彈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便使春梅瞧數次，不見動靜。正是：銀箏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彈。取過琵琶，橫在膝上，低低彈了個《二犯江兒水》，以遺其悶。在床上和衣兒又睡不著，不免

「悶把轉屏來靠，和衣強睡倒。」

猛聽的房檐上鐵馬兒一片聲響，只道西門慶

來到，敲的門環兒響，連忙使春梅去瞧。春梅回

道：「娘錯了，是外邊風起落雪了。」婦人於是

彈唱道：

「聽風聲嘹亮，雪灑窗寮，任冰花片片飄。」

一回兒燈昏昏

盡，心裡欲待

去割纜，見西

門慶不來，又

意兒懶的動且

了。唱道：

「懶把寶燈挑

，慵將春篆燒

。（只是捱一

日似三秋，盼

一夜如半夏。）

捱過今宵，怕

到明朝。細尋

思，這煩惱何

日是了？（暗

想負心賊當初

說的話兒，心

中由不的我傷

情兒。）想起來，今

夜裡心兒內焦，誤了

我青春年少。（誰想

你弄的我三不歸，四

捕兒，著他，你撇

的人，有人稍來沒下

稍。」



### 金瓶梅作品賞析

張業敏◎選析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雙姝怨對金瓶梅：金瓶梅作品賞析／張業敏選析，  
——初版。——臺北市：開今文化出版：知道總  
經銷，1993 [ 民82 ]  
面； 公分。——（中國文學走廊；13）  
ISBN 957-8730-38-1（平裝）

415 · 271

82007472

中國文學走廊 ⑬

---

## 雙姝怨對金瓶梅——金瓶梅作品賞析

選 析／張業敏

發行人／冷遠玫

出版者／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61巷10號

郵撥◎1636829-2 開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5438號

---

執行編輯／諸葛蘭英

---

電腦排版／法德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印刷／世和印製企業公司

---

總 經 銷／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市木新路二段111巷12弄26號

電話◎（02）9395450 電傳◎9381823

郵撥◎1293515-1 知道出版有限公司

---

法律顧問／張泰昌律師

初 版／1993年（民82年）10月

定 價／新台幣150元

ISBN 957-8730-38-1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

◎本書由廣西教育出版社授權出版發行台灣地區繁體中文版

# 雙妹怨對金瓶梅

——《金瓶梅作品賞析》——

張業敏◎選析

出版

開今文化



## 漫步於中國文學的長廊

### 「中國文學走廊」出版序

冷遠玫

長廊，是一種最能反映中國人生活哲學的建築類型。中國的長廊，是爲了供人漫步而設，而漫步本身，卻並不是爲了甚麼。那是一種無所爲而爲。走在長廊上，清風徐來，一方面可以欣賞湖光山色，一方面可以沉思默想，那種悠然之樂，又豈是塵世間的功名利祿所可以提供的！

「中國文學走廊」也是這樣一條供人漫步的長廊，而它通過的，是中國文學的大觀園。

中國文學的傳統，源遠流長，從《詩經》算起，迄今已超過兩千多年，其間不但文類繁衍，而且即使在同一種文類中，也是名家輩出，各領風騷。浩瀚與繁富，固然讓中國文學成爲一座取之不盡、用之無竭的精神寶庫，但另一方面，卻也構成

一般讀者——特別是現代讀者——親近上的障礙。一個不是學文的讀者，一旦被拋擲到中國文學的大觀園，往往是目迷五色，不知所措。

有鑒於此，本社特別編纂了這一套「中國文學走廊」系列，為有心一窺中國文學之美的讀者提供一條可循的途徑。顧名思義，這是一條經過精心規劃的長廊，它會帶領讀者走過一個一個值得瀏覽細味的風景點。

「中國文學走廊」系列中的每一單元都由大陸上學有專精的學者執筆，絕對夠得上是嚴謹之作。但我們請讀者不要抱著「讀書」的心情去「讀」它。我們所希望的，是讀者能應我們的邀約，放鬆心情，與我們一起漫步於中國文學的長廊上。這裡風光無限，美不勝收。

在車馬喧囂之餘，走入「中國文學走廊」，信步行來，偶拈一則，思出物外，此樂可極！是為序。

## 古典寫實小說的豐碑

### ——金瓶梅

張業敏

遠在十六世紀初，我國即已出現了《金瓶梅》這樣一部具備了近代現實主義流派小說特質的文學巨著。它的出現，比近代歐洲現實主義小說大師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作品分別早了二至三百年。在我國乃至世界小說史上，它的出現確實是一個奇跡。當這部「奇書」剛一問世，便以其非同一般的內容和表現形式震動了當時的文壇和社會，譽之者稱它為「逸典」（沈德符），與《水滸傳》、《西遊記》合稱「三大奇書」，並以它為首，稱「第一奇書」；毀之者竭力詆毀詈罵，斥之為「誨淫」，以「淫書」目之，把它看得比洪水猛獸還可怕！同時，又由於它的作者不明，內容繁富而倘恍，人物衆多而色彩駁雜，因此數百年來引起人們對它探討的廣泛興趣——從考證作者、成書經過和創作年代，到探求寓意，索隱本事，以及評估價值。在探討中，大多衆說紛紜，莫衷一是。加以它幾乎一直被列為「禁書」，使廣大讀者求閱而不得，這就更使它籠罩在一層神秘的煙霧之中。

《金瓶梅》的作者是誰？這是至今未能揭開的一個謎，以至於有人把這個問題列入了「中國文化之謎」。幾百年來，猜測推斷作者是中晚明大名士王世貞（後「七子」首領）的最多，但卻拿不出確鑿證據。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山西發現晚明刻本《金瓶梅詞話》，正

文前有化名「欣欣子」的人所寫的〈序〉，指明小說的作者為「蘭陵笑笑生」。但「笑笑生」顯然是化名（筆名），於是有的論者認為「笑笑生」即王世貞。但明史專家吳晗後來以確鑿的證據徹底否定了王世貞說。從那以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研究者們根據各自的考據，先後提出了一大批作者的名單，如：盧楠、徐渭、李贄、薛應旗、趙南星、馮惟敏、吳儂、賈夢龍、賈三近、謝榛、屠隆、馮夢龍、湯顯祖、李開先、劉九等等，至今仍未有定論。

《金瓶梅》的版本：一種是手抄本，現已不存；第二種是刊本（刻本），現存世最早的刻本即《金瓶梅詞話》本；第三種是改編本，有明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本；第四種是評點本，即《皋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本，為清初彭城人張竹坡評點（張亦因此而出名）。除此之外，自清乾隆以來，還出現過各種低劣的印本，此乃書商為圖利增刪上述各本而成，常冠以「古本」、「真本」之名，其實質量低劣，錯漏迭見，可稱之為「偽本」。

《金瓶梅》故事基本是由《水滸傳》第廿二回至第廿五回敘寫「武松殺嫂」一段情節敷衍而成。全書圍繞著男主人公西門慶的生活道路展開。西門慶原是個破落財主，又是個地痞流氓。他以開生藥鋪發家，逐步往上爬，爬到拜當朝宰相蔡京為義父，又與朝廷和地方權貴結交，自己更升官發財。家有一妻五妾，仍不停姦淫僕婦丫環、嫖宿娼妓、勾引貴婦、蓄置外室、玩弄男寵，為霸占他人妻而害死人命多條。其家中妻妾亦為爭寵而互相傾軋，並偷人



養漢。五妾潘金蓮設法害死了六妾李瓶兒所生的兒子，致使李瓶兒也憂傷致死。以後潘金蓮又讓西門慶吞服過量的春藥，使西門慶終因縱欲過度而暴死。西門慶死後，家境衰敗，眾妾星散，潘金蓮伙同春梅丫頭與女婿陳經濟通姦，事發被逐賣，不久即被前夫武大之弟武松殺死。只有正妻吳月娘爲他守寡，後來月娘所生遺腹子在戰亂中被高僧點化出家爲僧。故事在一片虛無的境界中結束。

明人袁中道說：「《金瓶梅》大約模寫兒女情態俱備，乃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潘）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游居柿錄》）概括了全書基本內容，並詮釋了書名。

(一)

小說像其他藝術品種一樣，目的在於創造藝術美。《金瓶梅》是通過對現實醜惡大曝光，而實現「化醜爲美」的（化生活之醜爲藝術之美）——這是作者所著意選定的審美視角。

《金瓶梅》所描寫的中晚明，是一個昏天黑地的時代：皇帝昏庸，權奸亂政，宦官專權，特務橫行，社會現實黑暗至極。與政治腐敗的同時，經濟上一個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城市經濟繁榮與市民階層壯大，與之相應的便是商品經濟得到極大發展，和隨之而來的東南沿海地區某些行業中開始出現了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萌芽。這一變化有力地改變了中國歷來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市井商人的社會地位亦有了迅速提高。官僚士大夫開始與過去爲他們

所看不起的商人交往，於是出現了士商和官商互相勾結滲透的現象。商品經濟的發展更刺激了上層人士的消費欲望。因而金錢對人們的支配力量也就越來越大。從皇帝到朝臣到中下級官吏，都無不狠命搜刮錢財，賣官鬻爵之風大盛，封建綱常禮教已喪失維繫人心的力量，社會風氣也因此更加敗壞。

《金瓶梅》所要反映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和社會。作者對社會普遍的腐敗與無邊的黑暗是憤怒的。欣欣子說他「憂鬱為甚」，張竹坡說他是「忍憤作書」、「作穢言以泄憤」，都是符合實際的。作者正是滿懷憤激之情，以犀利的筆鋒描繪了上至朝廷，下至市井庶民，凡所勾畫，無不衆相畢露，使人一讀之後，對當代各種社會醜惡洞若觀火。

《金瓶梅》曝光社會醜惡，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小說通過西門慶及其一家的社會交往，多層次、多側面地表現了王朝政治的黑暗和吏治的腐敗。正如魯迅所說：「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為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中國小說史略》）例如小說中雖然沒有直接描寫社會的主體階級——農民階級和農村情況，但通過寫「皇莊」「官莊」的擴大，反映出地主豪紳兼併農民土地的激烈和農村經濟破敗情況，小說還通過寫清河縣薛、劉二太監的煊赫聲勢和太監六黃太尉經山東時的威風，以及朝中童太尉、何太監的權勢，生動地表現出太監專權的政治實際。特別是小說寫得最多的關於西門慶結交權貴的情節，反映出當時的政治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最集中表現在腐敗的吏治之上。正如小說第三十八回中所說：「天下失政，

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個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爵，賄賂公行，懸秤升官，指方補價，寅緣鑽刺者，驟升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贓官污吏，遍滿天下。」雖然表面上寫的是北宋，其實正是中晚明現實的一個簡要的概括。西門慶正是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如魚得水，通過向朝廷權貴多次行賄送禮而躲過王法制裁、並當上地方提刑官的。西門慶當官之後，貪贓枉法、草菅人命、作惡多端，但因為他用金錢早已買通了上下左右，所以無人能奈何他。作者在書中一再感慨道：「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又道：「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正是黑暗政治的形象概括。西門慶的種種罪惡行徑都是在與社會各階層各色人等發生種種聯繫中進行的。他一生的所作所為，他與他的家庭所聯繫著的各色各樣的人物一起，共同顯示出一個鬼蜮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有的是昏庸的皇帝、貪婪的權臣、墮落的儒林、無恥的幫閒篋片、齷齪邪惡的僧道、淫濫的妻妾娼妓、欺詐成性的奴婢小人。小說從普遍聯繫中暴露一方的黑暗，也就有力地證明了這黑暗決非偶然與個別。《金瓶梅》正是通過寫西門慶的罪惡及其與上下左右前後後的聯繫，從「一家」而及「天下國家」，由點及面，由廣及深，從而反映了十六世紀後期中國廣闊的社會面貌，表現出罕有的文學力度。

其次，小說把對社會黑暗和罪惡的暴露，抽象為哲學上的思考，就是對所謂「四貪」（酒、色、財、氣）等「人欲」的批判。整部小說的思想內涵，正是立足於暴露「四貪」之病，特別是「情色之累」的哲理性思考之上。在作者看來，「四貪」——特別是「財色」之

貪，正是人性的弱點和病根。在「王學左派」哲學思想廣為流行的當時，頗具市民意識的作者並不一般地否定人的「財色」之欲，而只是對過分追求（即「貪」）「財色」不滿，認為這會導致罪惡，並將害人害己，所以必須予以告誡。他認為在「財色」之貪中，對「色」的貪求又最危險，這就是「情色之累」。作品中西門慶與潘金蓮這對男女之所以惡，就是「情色之累」的結果。因為色欲太旺，欲壑難平，因而便敗風紀，毀人倫，乃至謀色害命，傷天害理，最後既害了別人，自己也不得好死。李瓶兒為人溫順寬厚，但亦因貪欲，最後竟「血崩」而死。龐春梅在奴僕中鶴立雞群，但高傲的氣質中卻包含著淫欲，最後雖貴為守備夫人，卻仍因縱欲過度生「骨蒸癆症」而死。作品中寫西門慶與「三大淫婦」都因貪欲而死，表現了「死亡主題」，從而批判了「情色之累」，體現了作者的道德判斷，並以此探討了社會、人生和人性問題。

第三，作為一部最有名的「世情書」，《金瓶梅》又著意於「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描寫世態，盡其情偽」（魯迅語）。在作者看來，「貪」與「累」是人性弱點的本質，而其外部表現形式則是「情偽」，是「炎涼」，所以書中不僅暴露出這種黑暗的生活面和人性的弱點，而且還揭露和批判了這種生活和人性的社會風俗和社會關係，以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張竹坡以為《金瓶梅》的全部內容「總是冷熱二字」，所以是「一部炎涼書」。小說正是通過西門慶家庭的興衰榮枯，把中晚明社會中人的虛偽、勢利、冷酷和利己主義本質全昭示了出來。所謂人情的「冷熱」，全由富貴貧賤決定。當西門慶權勢顯赫、富

甲一方時，宦宦親友無一不想與他結交，市井無賴和幫閒走狗更是趨之若鶩。而當西門慶一死、權勢頓失之後，家庭內外，從妻妾奴僕到至親好友，一個個全換了副臉嘴，對西門家大有牆倒眾人推之勢，連一向受西門慶恩惠最多的幫閒走狗，此刻竟成了挖牆角、企圖霸占西門家產業的主謀和元凶（如應伯爵、吳典恩）。這種炎涼冷熱的強烈反差正如小說中所感慨的：「時來頑鐵有光輝，運退真金無顏色。」特別有意義的是作品還寫出了在這種為財勢左右的澆薄世風中，封建禮法最講究的人倫綱常也被扭曲、破損得不像樣子了。因「冷熱」而顛倒了人倫的真假——書中到處都是呼「爹」喚「娘」、稱「兄」道「弟」聲，但全是假的，而真的父母、子女、手足、夫婦之間，卻充滿了虛偽與絕情。真情已被假化，說明這個社會裡已沒有了真情。

欣欣子〈序〉中說：「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終。」又說小說對「關係世道風化，懲戒善惡，滌慮洗心，無不小補。」另一個與他同時代的評論家東吳弄珠客也作〈序〉說：「（《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蓋爲世戒，非爲世勸。」兩人都強調《金瓶梅》作者的創作動機在於進行道德勸誡，亦即勸善誡惡。這是對的。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小說家的創作動機大多如此，《金瓶梅》作者也不例外。作者曝光生活中的黑暗面（假醜惡），正是爲激發人們去追求真善美。化醜爲美的終極目的亦在於此。德國劇作家席勒說：「正因爲罪惡的對照，美德才愈加明顯。所以誰要是抱著摧毀罪惡的目的，……那麼他就必須把罪

惡的一切醜態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來，並且把罪惡的巨大形象展現在人類眼前。」（《強盜·序》）用這話說明《金瓶梅》的立意，無疑也是適合的。

《金瓶梅》作者真善美的理想在作品中體現為「善」的觀念。但作者心目中的「善」是十分複雜的——凡作者所暴露批判的假醜惡的對立面都是「善」。作者雖然在時代進步思潮感發之下有些新思想萌芽，但作為一個封建文人，他觀念中的「善」仍然主要是封建綱常倫理和道德規範那一套。這種觀念雖不乏與人民意願一致之處，但主要還是有利於封建統治階級，所以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特別是作者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和「女人禍水」等思想糟粕，常導致他善惡界限模糊，是非混淆乃至顛倒，影響了小說暴露與批判的深度。作者一面痛感到大廈將崩的現實中存在諸多不合理因素，但卻又看不到前途，找不到解決的辦法，因而有一種刻骨銘心的悲哀，只好寄希望於神佛。這使全書中都瀰漫著一種因果輪迴的小乘佛教的迷霧。作品中的情節「種種皆不出循環之機」（欣欣子），「處處埋伏因果」（明·廿公），於是一切人間的恩怨善惡，便都成了「天意」——這種封建迷信的宿命思想，自然是作品的思想糟粕，不足為訓。

(二)

在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的中晚明，與趨向塵世享樂和塵世利益的經濟生活相適應，思想文化領域中也興起「反宋明理學禁欲主義而趨向於塵世世界的啓蒙運動。這場運動雖然是以哲學

為主導，但文學是時代的風帆，總是得風氣之先；而走在最前面的，又是作為通俗文學的小說。在成就最為傑出的長篇小說領域裡，如果說歷史演義小說《三國演義》、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和神魔小說《西遊記》是啓蒙思想家們進行啓蒙的思想材料，那麼直接體現市民意識的《金瓶梅》，則是在啓蒙思想直接影響之下的啓蒙文學碩果。它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發展道路上的一塊豐碑，標誌著我國具有近代寫實特色的現實主義派小說的真正開端。文學史家鄭振鐸說：

《金瓶梅》實是一部可詫異的偉大寫實小說。它不是一部傳奇，實是一部名不愧實的最合於現代意義的小說……是一部純粹寫實主義小說……是赤裸裸的絕對的人情描寫；不誇張也不過度形容。（《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就是說，《金瓶梅》已不像演義、傳奇和神魔小說那樣寫非凡人物和他們離奇的故事，不再追求驚心動魄，也不再是粗線條、強烈誇張地勾畫人物形象，而是徹底擺脫了「傳奇」、「志怪」的影響和傳統，以平實細密的寫實風格，按生活原型那樣去表現瑣而俗的現實題材，卻又因小見大，寓不平凡於平凡之中，反映出生活中的本質。

但《金瓶梅》寫實特色最突出的表現，還是在典型人物性格的塑造之上。《金瓶梅》中的人物多半是複雜的，就像生活中的人本身那樣複雜，也因此其性格更具典型意義。

這種複雜的典型性格首先就體現於性格的多色彩（雜色）之上。「雜色」是《金瓶梅》

的人物特色。

高爾基說：「人是雜色的，沒有整個是黑的，也沒有整個是白的。好的和壞的，在他們身上攪在一起了。」（《給西瓦喬夫》）所謂「雜色」，指的是性格的多層次、多側面、甚至矛盾因素同時並存（有一種「二律背反」的性格）的複雜現象。但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常執著於文學社會功利考慮，受封建倫理道德觀念主導，常將筆下的人物表現為一種理念（「美德」、「惡德」、或某種性格類型）的化身，以求引起讀者一種定向的情感共鳴，從而達到某種教化目的。這種創作傾向即使像《三國》《水滸》《西遊》這樣優秀的作品也概莫能免，書中的好人與壞人涇渭分明即是明證。但這種情況在《金瓶梅》中卻得到徹底改觀。

《金瓶梅》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 是生活中所能有的、並有代表性的人物。對這些人物的複雜性格進行「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就必然會使這些人物既能體現一定的生活本質，又確是生活中鮮明生動的「這一個」，因而也就成了個性化的典型性格。

例如西門慶就是《金瓶梅》衆生相中，寫得極為成功的典型性格之一。

「世之大淨」西門慶無疑是邪惡的。但正是這個「四貪」的代表人物，卻是那個社會中百分之百的強者。作者賦予他資本主義萌芽期市井商人特有的野性力量與進攻態勢。他的強悍和野心，使他在商場、官場和情場中都成為勝利者，正因此也就成了生活的主宰者。

西門慶是一個在那個特定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所特有的「官、商、紳」三結合的人物。作為暴發戶商人，他信奉金錢萬能，因此不擇手段聚斂財富，坑、



拐、搶、騙、投機倒把、高利貸盤剝，無所不爲；作爲封建官吏，他善於夤緣鑽營、攀附權貴，又善於隨機應變、假公濟私、營私舞弊、貪贓枉法，壞事幹盡幹絕；作爲地方土豪劣紳，他靠著錢財和流氓手段，無休止地姦淫占有女性，無恥地放縱情欲，成爲罕見的色情狂。這些都構成西門慶性格的本質特徵。但西門慶作爲生活中一個普遍的活人，他仍然還有著多數人都有的人之常情。比如他斂財卻並不視錢如命，有時還「仗義疏財」，周濟他的窮哥們；他於色情場中獸性十足，但對替他生了兒子的瓶兒的溫情，卻似乎超越了醜惡的情欲而具有夫妻情分；此外，他的愛子之心和臨終前對妻離子散的憂慮等等，這些不無人情味的表現，都表明作者沒有以「惡德」的觀念去醜化這個人物，所以筆下的西門慶只是現實中的「惡人」而非「惡鬼」。

當然，西門慶之複雜，還不止於性格因素本身的多側面，其典型意義也不止於此。

作爲「惡人」的西門慶成爲中晚明社會中具有主宰社會的一種力量，是資本主義萌芽期作爲資產階級前身的新興市井商人的勢力顯示。但西門慶最終還是一個生活中的失敗者。他通過不等價交換積累了巨大財富，但卻並不像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商人那樣：一方面罪惡累累的惡棍；另一方面又是具有強烈進取精神和開拓意識的事業家。西門慶始終沒有將其巨大的商業資本進一步轉化爲工業資本，而是走著「賺錢——置房產——討小老婆」這樣一條封建官紳的老路，甚至使其資財最終失去了商業資本應有的形態，而只成爲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極度膨脹的消費意識的物質保障。就在他的「事業」（對財產和異性的占有）